Blue Book of
Ageing-Responsive Civilization
2022

老龄文明蓝皮书
2022

老龄文明智库　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Blue Book of
Ageing-Responsive Civilization
2022

老龄文明蓝皮书
2022

老龄文明智库　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龄文明蓝皮书. 2022 / 老龄文明智库编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2

ISBN 978-7-214-28034-3

Ⅰ. ①老… Ⅱ. ①老… Ⅲ. ①老龄产业—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江苏— 2022 Ⅳ. ① D669.6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15505 号

书　　名　老龄文明蓝皮书 2022

编 著 者　老龄文明智库
责任编辑　薛耀华　陈　颖
装帧设计　刘　俊
责任监制　王　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照　　排　南京私书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2.5　　插页　4
字　　数　498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8034-3
定　　价　1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老龄文明蓝皮书2022》
编委会

主　任

王燕文

副主任

樊和平　林闽钢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　宇　公永刚　叶南客　田　侃　朱　岷　刘　云

刘大威　刘西忠　孙　伟　贡旭敏　芮国兴　李　静

李荣锦　李程骅　杨　勇　吴剑卿　邱泽森　沙　勇

沙维伟　张红军　张宏伟　张晶晶　陈友华　陈正邦

周　岚　周　颖　周铁根　赵　媛　胡学同　拜争刚

姚兆余　高传胜　黄永春　曹玉梅　鲁　翔　薛劲松

前言：老龄化与老龄文明

樊　浩

人口老龄化已经是普遍世界现象，迅速而深度推进的老龄化将成为中国发展长期遭遇的最严峻挑战。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将达3.7亿，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比美国现有人口还多4000多万。我们持续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最担忧的第三大问题。[①] 人类已经走进一种西方学者所谓“未经充分准备的生活”的非常时代；文明已经走到这样的历史关头，不是在老龄化中老去，就是在老龄化中涅槃。文化大智慧不是背负匆匆忧心继续生活，而是将已经到来的生活提升为“好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坚守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于是，具有决定未来意义的不是对于老龄化的“应急反应”和应对谋划，而是关于老龄化的文化态度及其顶层设计的哲学理念。当前亟须完成的任务是超越对老龄化的过度忧患甚至文化恐惧，将其回归为一种必然并且具有文明史意义的重大人类进程，以一种“积极”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战略拥抱并驾驭老龄化，

① 中国社会大众最担忧的三大问题分别是：腐败不能根治；生态环境恶化；老无所养，对未来没有把握。参见樊浩《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而不是“消极”地适应和应对，达到真正的“积极老龄化”。

为此，亟须寻找一种宣示对待老龄化的文化态度、体现老龄化战略理念的总体性话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考察，这个总体话语就是：老龄文明。具体地说，在理论和实践上，必须将“老龄化”推进为“老龄文明”，以“老龄文明”作为老龄化的文化话语和战略理念，发现并肯定老龄化的文明史意义，实施“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老龄化战略”。

一、老龄化的“积极”话语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对人口老龄化作了如下表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三大定位体现对老龄化的事实判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将老龄化从事实判断推进为价值判断，不仅在问题应对，而且在文明建构的意义上进行关于老龄化的整体性谋划。一句话，如何寻找关于老龄化的“积极”话语？

仔细反思可以发现，“老龄化”的话语以隐晦的方式宣示了一种社会心态。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趋向，往往有两套话语系统，即陈述话语与情态话语。因信息、网络技术产生的社会变化，被表述为“智慧”或“智能”，如智慧生活、智能治理，它宣示人们对技术改变生活的肯定甚至追逐的态度，肯定是如此强烈，乃至不仅将人类所独有的智慧、智能等慷慨赋予自己所创造的物，而且携带某种心理暗示甚至文化诱导，似乎以往的生活不够智慧或智能化程度不高。这种话语可以称之为情态话语，它传递和表达了人们对特定对象的肯定性的情感和态度，其中包含了价值判断。另一套话语可称之为陈述话语，其特点是对表达的对象进行某种客观性描述，如老龄化、新冠肺炎疫情等。陈述话语试图客观描述事实，在表达方式上采取对象化的形态，表面上体现关于对象的客观态度，在价值上似乎具有中立的特征，将其作为认知或者治理的对象。对象化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态度，往往隐含问题性甚至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只是以描述替代情感，以事实陈述回避价值判断。

“老龄化”是典型的描述或陈述话语，它回避了价值判断，但并不能逃

避价值判断，一旦诉诸社会行动，其中潜隐的价值态度便可能还原甚至放大为深刻的现实偏差。这里存在关于“老龄化”话语的事实与价值、实态与情态的悖论。一方面，如果因为全社会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突破某种预设的限度、高龄现象普遍出现而称之为“老龄化”，那么最需要认真对待的便不是老龄本身，而是修正老龄的标准和对待老龄的态度，一旦老龄标准被修正，所谓“老龄化”就是一个虚命题。所谓“老”只是一个相对于个体生命节律和社会寿命预期的概念，可以假设，在现代寿命事实以及未来预期背景下，如果以70岁为老龄的标准，那么社会便没有进入老龄化，老和老龄都是被社会建构的概念。另一方面，如果老龄人口真的在人口结构中达到相当程度并已经成为“化”的普遍事实，那么它便不仅是一个必须被应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将造就出“化”社会的事实，成为“化”社会的力量，老龄便因为在人口中的巨大比例而从对象成为主体，从而“化”出一种社会文明。这一悖论表明，“老龄化”逻辑和历史地不只是实态，而且是情态；不只是事实，更不只是问题，而且是一种文明现象或文明形态。悖论的第一方面表明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与寿命延长相联系；悖论的第二方面表明老龄化必将造就新的社会文明。无论如何，“老龄化”的话语既不足以陈述事实，又逃避了价值判断，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这种逃避可能产生全社会的价值误导和战略误判。必须以“文明”对待和表述老龄化，在话语形态上从“老龄化”转换为“老龄文明”，以“老龄文明”作为“老龄化”的替代性话语或情态话语。

以何种问题意识看待和对待老龄化，危机，还是时机？面对席卷而来的老龄化，化危机为时机，关键是以何种哲学理念和文化战略应对老龄化，要义是将人口老龄化从“重要趋势”“基本国情”，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的事实判断，推进为“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的价值建构，使老龄化从趋势、国情的危机意识，转换为“‘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的时机理念。

为此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的话语时态和话语情态是什么？时态是其历史坐标和时代取向；情态是文化态度。“老龄化”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述，然而，其一，它只是事实判断，以过去长期存在的人口结构标准以

及社会生活的“常态”为历史坐标；其二，这一判断包含强烈而单向的忧患意识，容易在“趋势”“国情”的认知下将老龄化只当作负面现象即西方学者所说的“文明剩余物”，而遮蔽“危机”背后的“时机”。“过去”的时态与忧患的情态是“老龄化”这一描述性话语的文化气质。也许正因为不满足于这一表达，有“长寿时代”的另一种话语。“长寿时代可以启迪人们跳出‘老龄化’圈定的固有框架，一个新时代来临，必将对旧时代带来全面的重构。人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更宏大的语境中，积极地思考未来，畅想未来。”[①] 与“老龄化”相比，“长寿时代”的话语跳出单向忧患意识的“圈子”，利于更积极地思考和畅想未来，但从根本上说，它所谓的“长”依然囿于“过去”的坐标系和事实判断的“圈子”。“老龄化”基于“趋势”和“国情”，而“长寿时代”也只是把长寿当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于是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那样，只能“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未来”。

人口老龄化应当寻找一种不只是面向过去和现在而且面向未来的话语形态，这就是“老龄文明”。由于它传递一种更积极地思考和畅想未来的对待老龄化的哲学理念和文化态度，因而既是一种话语时态，也是一种话语情态。“老龄文明”从文明形态尤其社会文明的维度，把握人口老龄化对人类文明所产生的全面深刻的影响，在文化心态和战略理念上不只是忧心忡忡、就事论事地看待和应对老龄化，而是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合理性的意义上，在迎接挑战中满怀信心地建构新的人类文明。只有在“老龄文明”的话语形态及其战略理念下，老龄化，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全面而深刻的老龄化，才可能不致被满怀忧心地当作一次漫长危机，而且成为文明进步的又一个重大时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国情才可能转化为创造新的社会文明的另一种“人口红利”。

“积极老龄化”首先必须寻找关于老龄化的积极话语，以此造就老龄社会的积极心态和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战略。话语不仅表达和渲染心态，也造就心态。“老龄文明”是面向未来的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话语时态和话语情态，是关于老龄化的“积极”话语，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理念。它从四个

① 陈东升：《长寿时代》，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前言，XXV。

方面宣示对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国情的文化态度与文明战略：以社会文明看待老龄化；老龄社会的文明建构和文明气象；老龄社会的文明革命；基于社会文明的老龄化战略。“老龄文明”的话语和战略的要义一言以概之：让老龄化成为社会文明。

二、以“文明”看待老龄化

（一）问题意识与文明意识

中国老龄化遇到的第一问题是：到底应当建立何种关于老龄化的集体意识？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推进的层次：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意识是什么？问题意识是否足以构成老龄化战略的理性基础？理论假设是：中国老龄化需要以“试验—超载”为基本结构的问题意识，但更期待将问题意识推进为文明意识，实现由问题意识向文明意识的转化。

老龄化是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从经济向人文尤其向伦理转向的过程。19世纪中叶，法国、挪威、瑞典等欧洲国家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随后这一进程不断加深，但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的研究只是聚焦于经济，讨论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联合国发布《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老龄化进入“社会”视野；1982年，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从发展与人道两方面关心老龄问题，伦理出场；2002年，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理念，在文明素质意义上考察老龄化。伴随老龄化进程，西方世界体现了“经济—社会—伦理—文明”的“老龄觉悟”的轨迹。

应该说，当今中国的老龄化虽然迅速而全面，但比起西方世界来得要迟。作为“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老”和“老龄”首先与平均寿命及其预期相联系，但是中国的老龄化却遭遇了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国情。与世界范围内的老龄化进程相比，中国老龄化的最大难题，就是老龄化邂逅独生子女，使中国的老龄化在人口、经济、文化、社会方面全方位“超载”。“试验”与“超载”，是体现老龄化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两个关键词。

中国的老龄化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惑之境”

中走向纵深，其直接背景就是延续4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这场空前的社会和文化试验。在文明体系意义上，独生子女解构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家庭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使老龄化问题空前严峻。在传统多子女的中国家庭中，养老在风俗习惯和伦理制度两方面为子女尤其男性子女所分担，“养儿防老”不仅是传统观念，也是自然伦理安全的文化设计和制度安排。在这一背景下，生活水平固然提高缓慢，但在家庭中养老送终的伦理安全是自然地存在的，老龄孤独等也并未成为普遍现象。独生子女所导致的家庭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经济能力方面而且体现在伦理能力方面。独生子女在经济和精力方面都难以承受“1+8”的重负，更深刻的变化发生于伦理领域，产生了伦理观念和伦理能力的双重断裂。一方面，独生子女因其家庭伦理结构的单一性，以往丰富复杂的伦理关系消失，在伦理孤独的同时，也难以在家庭中受到充分的伦理训练和伦理浸润，家庭作为伦理策源地的文化功能难以挽回地式微。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的伦理经历和伦理体验过于单一甚至贫乏，家庭中伦理成长的机会不够丰富深刻，独生子女与长者长寿相遇，使家庭的伦理能力十分脆弱，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家庭伦理的文化断裂。根据我们持续进行的全国调查，在2007年到2017年的短短十年中，关于家庭的伦理忧患，已经从“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薄弱”的道德忧患，转向“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老无所养”的伦理能力忧患。[①] 独生子女当然不是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全世界独生子女甚至无子女家庭很多，但独生子女确实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更具中国特色，因为千百年来中国的养老从来就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因而即便有老龄化，也不像今天这样严峻。

在这一背景下，如果可以用一个概念表达中国老龄化的挑战，那就是“超载”，不仅是未富先老的经济上的超载，更深刻也更具基础意义的是独生子女所导致的伦理上的超载——家庭自然伦理安全解构所导致的伦理上的超载，同时，家庭结构的持续性变化，也导致整个社会文化上的超载。中国老龄化所面临的超载，是伦理、经济、文化、社会意义上的全面超载。有人说，中国的老龄化是“未备先老”。其实，没有任何国家是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

① 参见樊浩《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走上老龄化道路的，老龄化之被称为老龄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未被准备的生活”，任何国家都是未备先老，它是老龄化的共同际遇。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老龄化需要有特殊的问题意识，它是以独生子女的社会试验和“超载”两大关键词为基础所形成的问题意识的谱系。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最大最特殊的中国国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任何国际经验可借鉴，无任何国家可以帮助——“四无”使中国的老龄化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延续近半个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在出生率降低成为全球难题的背景下，它可能也后无来者；正因为如此，中国无任何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作为占人类总数三分之一的大国，尤其是在老龄人口超出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的人口总数的背景下，也无任何国家可以帮助。迎接老龄化的挑战，唯一的选择，是以创新性的理论和创造性的实践在老龄化进程中达到民族更生、文明更生。

在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进程中考察，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而且是一场空前和持续的社会和文化试验，将其作为社会试验才能真正理解它的社会历史意义，也才能找到超越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试验”和“超载”，才是作为中国老龄化的特殊背景和特殊国情的两个关键词。将独生子女政策扩展为社会试验的意义，在于将与它相伴随的老龄化由问题意识推进至文明意识。老龄化无疑需要敏锐而急迫的问题意识，然而问题意识并不足以破解老龄化难题，更需要文明意识。只有在文明意识的宏大视野下，老龄化才可能从危机转化为发展的一次时机。

中国的老龄化虽不是社会试验的产物，但却与独生子女政策这样空前的社会试验紧密相连。独生子女政策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气质尤其是伦理气质，与之相伴的老龄化不仅与这种文化气质相关联，而且也期待特殊的文明设计，并必将生成新的文明。为此，对于老龄化的认知和关于老龄化的谋划，不仅受问题意识的驱动，而且应当受文明意识的激发；在文明史尤其是现代中国文明史的进程中，不只是将其作为“老龄问题”应对和治理，而是应将其作为文明进步的一次历史机遇，建构“老龄文明”的积极意识、积极心态和积极战略。现代中国曾进行过多次社会试验，如“上山下乡”和“独生子女”，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更多停留于社会问题反思，缺乏文明史意

义上的整体性思考。中国的老龄化是又一场新的社会和文化试验，面对独生子女这一空前的社会文化试验的背景和超载的社会现实，必须以“试验”对“试验”，以创新的勇气和创造性努力，进行一场以老龄化为契机的文明试验。老龄化提供了另一次机会，试验启动之初前瞻性地建构自觉的文明和文明史意识，对其进行能动的文明设计，便可以将这一严峻挑战甚至危机转换为文明进步的一次历史时机。因此，问题意识向文明意识的推进，问题意识—文明意识的双重意识，是老龄化的中国意识和中国理论的基本内涵。

（二）孝道的文明密码

“孝”被公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最具标识性，也是中国老龄化社会最期待的德性，老龄人最后最重要的伦理安全屏障。在中国传统中，孝不只是基于问题意识即对于不孝的问题治理，乃至不只是传统伦理的核心，而是整个中国文明的顶层设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深邃人文精神和文明大智慧。

“孝”之为文明意识和文明设计，必须将它与“道”相关联，“孝”是也必须是一种“道”，所谓“孝道”。“孝”何以为“道”？是何种“道”？归根到底，它是文明之“道”，是文明之“道”的基石和顶层设计。理解中国文化的孝道，应当对三个命题进行贯通理解：“百善孝为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色难”。孝为何成为百善之首或中国文化的元价值、元德性？千百年来，孝道为中华民族所坚守，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尤其是西周维新中最重要的人文启蒙之一，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个体安身立命和种族绵延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如何对待老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重要标尺之一。爱自己的孩子，扩而言之对下一代的爱，相当程度上是本能。恩格斯曾说爱自己的孩子是老母鸡都会的事，然而爱老人却需要启蒙。原始社会曾存在的食老人现象，不仅因为食物的匮乏，而且本身就是未开化的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伦理上自给自足，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伦理上的自给自足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提供了文化保障。传统中国社会个体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都首先在家庭中完成，个体奉献于家庭，最后也由家庭尤其子女养老送终，无须也不可能外求，由此形成家庭伦理实体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

但是，家庭的终极关怀不局限于自然生命养老送终，更是个体在精神上达到永恒不朽的自然基础。人因其个体性与有限性产生对永恒与不朽的终极追求，在现有人类文明中，达到永恒不朽的路径有两种：一是出世的宗教，在彼岸和来世的天国实现；一是在入世的伦理中实现。这便是西方宗教型文化与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区分：前者的文明设计是“永远活在上帝手中”；后者的文明智慧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中国传统伦理所指明的达到不朽的路径有三：立德、立言、立功，然而这都是精英的专利，村夫村妇如何达到永恒？最简洁最自然也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路径，就是在血缘生命的延续中实现。孔子虽然去世两千多年，然而即便没有《论语》，在其第76代孙等人的身体中还流淌着孔子的血液，他已经万寿无疆。用当今的科学话语表述，这便是所谓基因遗传。在以男性为主轴的文明时代，男性至今依然是血缘大动脉的符号，于是便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何“无后”即没有儿子是最大不孝？这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封建意识，因为它是血缘大动脉的中断，使上一代永远失去了永恒不朽的机会。“孝”之所以为“道”，是因为它在世俗与精神的双重意义上都是个体尤其是老龄人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是人的终极关怀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现实性的顶层设计，是人的终极关怀的文明设计和文化智慧之道。正是基于“道”的文明本性，中国伦理对“孝”有很高的人文诉求。孔子认为，孝敬父母，最重要的不能是“能养”，而是“色难”。“色难”不仅是对父母的态度，也是一种文明教养，是“孝”成为“道”的文化启蒙和伦理教养。“百善之首”—“无后为大”—“色难”，使孝从问题意识提升为文明意识，成为文明的顶层设计，也成为中国伦理型文化独特的文明气象。

在任何文明形态和文化传统中，家庭都有作为自然伦理安全系统的功能设计。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中曾说，在伦理世界中，个体的命运就是死亡，家庭的重要使命是使死亡成为一个伦理事件。他将伦理世界当作个体与实体直接统一的世界：个体将自己奉献于家庭和民族的伦理性实体，将个体消融于实体之中，在与实体的直接同一中由自然存在提升为伦理存在，达到永恒不朽。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死亡就是个体的完成，家庭的任务就是使肉体生命的消失由自然事件成为伦理事件。每个人都会死亡，然而当个体

达到与实体同一的意识并奉献于实体时，便超越了个别与有限，达到了普遍与无限。家庭就是达到永恒不朽的自然伦理实体，个体在成为家庭成员的伦理行为中将死亡由自然事件提升为伦理事件。然而，在伦理性的中国文化中，孝作为特殊的人文智慧和文明设计，由一种具体的德提升为与天地宇宙合一的“道”，具有更重要的文明史意义。

在文明意识尤其是文明顶层设计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中国传统伦理中“孝”为何成为“经”，根本原因是它是一种“道”，并且是“达道”；也才可以理解，中国历史上为何出现并极力宣扬那些极端的孝道故事，如郭巨埋儿、卧冰取鱼等。这些故事用当今西方哲学的话语解释是“差异公正”，用中国话语表述是非常态背景下强制性的伦理设计。两个故事都发生于资源短缺的非常背景下。在问题意识下，“埋儿”不仅违反伦理，更违反法律。这个故事提出一个文明难题：在生命根源（父母）与生命支脉（子女）发生资源冲突的背景下，应当如何选择？选择支脉可能是一种自然反应，因为它代表未来；但选择根源，则便需要人文精神的强烈支持。前者是慈，后者是孝。黑格尔曾说，对子女的慈本质上是对夫妇双方共同作品的爱，既是自然本能，也具有伦理性，因为子女是婚姻双方的共同实体，所谓“爱情结晶”。但孝是与慈方向相反的伦理情感，子女将父母当作生命的根源，发现自己正是在生命根源的枯萎中成长起来，于是产生返本回报的伦理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慈是本能，孝期待伦理上的觉悟和启蒙。“埋儿”无疑不可取并且早已被摒弃，但只要不局限于问题意识，而是以一种文明意识和对于非常背景的文化设计意识，便可以发现其历史必然性。毕竟，它作为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并被认同的伦理典范，并不是“灌输”“欺骗”所能了结。比起郭巨埋儿，卧冰取鱼也许更能被理解和接受，其实，在孝之为“道”的意义上，二者是相通的，演绎的是同一种“道”即伦理文明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这两个故事所体现的强制性的伦理性设计，还有另一种文化智慧和制度取向，即当老年人在人生进程中走向弱势时，如何通过差异公正达到对其伦理上的保护。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孝顺”，不仅有“孝”，而且提倡“顺”，乃至到达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非理性的程度，其实，这都是非常背景下的伦理要求，体现的是一种非常文明取向和非常文化态度。

也许由此可以提供一种启迪：在老龄化的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何种“孝”？孝的失落是今天人们普遍担忧的现象，人们也将孝当作缓解老龄化难题的重要伦理期待之一。然而，老龄化社会所期待的，老龄化成为老龄文明所期待的，不是“孝”，而是“孝”通过转化创新成为时代之“道”。否则，社会的集体理性、老龄化的伦理战略，将停滞于呼唤独生子女的孝意识觉醒、治理不孝行为等就事论事的应时之策，难以真正使之成为一种“道”。简言之，只是停滞于问题意识，如治理不孝行为、为老龄人提供孝的伦理供给，如规定子女探望父母的时间频率等，难以上升为文明意识，更难以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文智慧和文明设计，甚至会出现学校教育中要求小学生在广场上为年轻父母洗脚等无伦理内涵更无文化底蕴的形式主义的伦理闹剧。显然，这不是缓解更不是解决老龄化进程中伦理短缺的良方，最多只是伦理上的短期行为，因为它局限于问题意识，缺少文明意识。

（三）“老龄文明”气象

“老龄文明”不是老龄人的文明，也不是对待老龄人的文明，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老龄化社会的文明，而是当老龄人在人口结构中达到一定比例之后，人类社会自力更生所期望建构和达到的文明。将老龄文明只理解为老龄人的文明是一种携带偏见和歧视的看法。老龄化社会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对在人生和社会的双重舞台上走向弱势的老龄人的或隐或显的歧视，是以处于生命青壮年的标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状态要求和裹挟老龄人，将他们踉踉跄跄地捆绑于时代步伐的腰带之上。无疑，老龄人需要与社会共同进步，老龄群体也面临许多在社会中与时代不同步的问题，还有走向人生晚年的社会心态问题，但社会进步本身具有相对性，它们很可能只是年轻人所追捧的所谓社会进步，而不是人人可分享的社会进步。所谓“老龄人的文明”局限于对老龄人的社会要求，它内含一种将老龄人作为规约、教化甚至批评的对象，社会生活中生命的强势群体在经济、科技、社会，以及文化、伦理上绑架老龄群体的巨大风险。“对待老龄人的文明”虽有合理内核，但它本质上将老龄群体对象化，而不是视为社会共同体中必然的和必须被尊敬肯定的生命机体，它是一种主客二分的伦理态度和哲学理念，没有将老龄人当作

社会主体，因而只是显示“对待”者即社会强势群体的“文明”，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文明。“老龄化社会的文明”是黑格尔所说的现实与合理的双重构造，广而言之，老龄化社会的一切合理现象都可以称之为老龄化社会的文明，它属于老龄化社会的自然进程。然而“老龄文明”则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是老龄群体在人口结构中达到相当程度后所建构和追求的社会文明的新形态和新境界，是人类文明的新觉悟和新进步。

“老龄文明”也不同于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所提出的从发展与人道两方面关心老龄问题，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等理念。老龄发展是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对待老龄人无疑期待人道主义精神，但当以人道呼吁善待老龄人时，已经触及文明的底线，而不是文明本身；“人人共享”是社会凝聚的基本条件，以此作为老龄化社会的呼唤，已经基于老龄人难以共享的现实，也难以将老龄人作为社会的主体。“老龄文明”或“老龄社会文明”的要义，是肯定老龄人作为社会参与主体的地位，要求社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体质与素质，从而达到新的文明境界；不是将老龄人作为失落和边缘的群体而为老龄人代言呼吁，其基本要求是“以文明看待老龄化”，以文明评判老龄化社会。据此，关于老龄化的任何社会应对，包括政治理念、公共政策、社会行动，都不只是基于对老龄群体的同情、理解、关怀，而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个体的文明教养。在“老龄文明”的理念下，不适应老龄化的社会，就是不文明的社会，也是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老龄文明”不是将老龄人作为被动的对象，而是自作在场的主体，老龄人依然处于社会舞台，它将对待老龄群体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作为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准。由此，老龄化才不局限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而且“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

要之，“老龄文明”的精髓，是以文明看待老龄化和老龄社会，其基本要求是将老龄化由问题意识上升为文明意识。根据“老龄文明”的理念，老龄人不是问题对象，而是关乎一种文明态度和文明教养；老龄化不是一种人口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现象；于是，老龄化问题，便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伦理问题、文化问题，是文明形态和文明的体质和素质问题。由此，社会注意力的重心，便不只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中青年的发展，还有老年人的

依归。老龄社会的文明气象，是幼儿园与养老院、童车与轮椅、健身房与广场舞、月子中心与临终关怀中心共富共荣，是真正的从摇篮到坟墓一体化的文明。

三、“老龄文明”的伦理革命

中国的老龄化达到老龄文明，期待一场文明革命；老龄化进程具有文明的意义，必将带来深刻的伦理革命。期待文明革命和实现文明革命，两种文明革命都以伦理为内核，老龄文明本质上是伦理革命。

无论世人心态如何，老龄化总以自己的节奏席卷而来，中国老龄化结出老龄文明的“积极”正果，由老龄化的“现存”提升为老龄文明的“合理”，期待一场以老龄生命伦理为核心的文明革命。以老龄化之前的既有文明理念和文明形态为参照，这场革命有四个基本结构：生命的时间伦理革命；生命价值的伦理革命；生命终极关怀的伦理革命；老龄权利的伦理革命。

（一）“老—龄”哲学与生命的时间伦理革命

时间是宇宙间最强大最公平的力量，因为任何存在者都无法逃脱时间的掌心，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时间是何种力量？是一切存在者都不能同时在场的力量。在时间之流的巨大宇宙力面前，一切都只是过程，有始点也有终点。正因为这种流动性，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强大的存在者最后终将归于消逝，但也正因为如此，一切也才有出场和在场的机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①] 在孔子看来，时间既如昼夜般周而复始，又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时间不仅是宇宙的宙斯，让一切成为沧桑，而且具有彻底的伦理性。一方面，在时间之流中一切生于无最后归于无，于是时间是最公平的力量，是伦理上的终极公正，世间任何问题最后都在时间中消融；另一方面，时间在使一切都归于无的运动中又给一切以出场和在场的机会，因而是生生的伦理力量。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时间这种消融一切、

① 《论语·子罕》。